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中国都市社会变动”国

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葛 涛

2006年1月14日，由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中国都市社会变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会场设于日本大学通信教育部。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会长、日本大学通信教育部部长高纲博文教授，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小滨正子教授等日本上海史学者对本次研讨会做了精心的筹备工作，并特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周武研究员、马军副研究员、葛涛助理研究员出席。会期一天，分别由两位日本学者和两位中国学者进行报告，由资深日本学者予以点评。进行报告的中国学者是周武研究员和马军副研究员，日本学者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金野纯和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大泽肇，葛涛助理研究员担任现场翻译。

一

1月14日上午10时，在高纲博文教授的简短致辞后，研讨会在京都大学教授上原一庆的主持下正式开始。作为报告者中最资深的学者，与会的许多日本学者对周武研究员的报告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多年潜心钻研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业，且已取得多项成果。他的报告题目即为《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至1956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

报告的前言部分指出：就现代中国的变迁而言，1945到1956年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年代。这是一个终结与开创交织的年代，一个市场与计划较量的年代，一个重建秩序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上海出版业也经历了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清季以来，上海一直占据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半壁江山，不仅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全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最健全的发行网络，而且汇聚着大批出版、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优秀人才，由上海出版、发行的图书和期刊，占全国出版总量的半数以上，是无可争议的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但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变更和计划出版体制的确立，上海在全国出版业中的中心地位迅速被共和国首都北京所取代，到1956年，上海仅剩下12家“专业化的”出版社，在全国的出版格局中，上海被彻底地“地方化”。

第一部分“‘苦闷’与‘萎缩’：内战状态下的上海出版业”主要阐述了：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出版业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时期。抗战时期一直滞留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在经历了漫长的凄风苦雨之后开始重拾旧业，抗战中内迁的出版机构开始成批地“复员”，在新的时局下一大批小出版社开始兴起，上海出版业再度呈现出多年未见的生机。但是，正当云集上海的出版家准备甩手大干的时候，全国的局势骤变，只经过不到半年的和平时期，中国再度转入战时状态。愈演愈烈的内战有力地抑制了这种生机。“苦闷”与“萎缩”，成了内战状态下的上海出版业的两大关键词。到了1949年解放前后，上海出版业除了极个别的书局如中华书局因为特殊的原因尚可勉强维持外，从整体上说，已到了山穷水尽、命若游丝的地步，出版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这固然是上海出版业的悲哀，但从另一方面讲也为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上海出版业的整顿和改造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二部分“公私之间：上海出版业的博弈”主要叙述了：上海的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国解放，给普遍陷入困境的上海出版业带来新的憧憬和希望。带着这种憧憬和希望，上海私营出版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初，全市私营出版业更达到了391家。如果单纯从数量上讲，这个数字创造了上海出版史上的最高峰。与私营出版业的发展状况相对应，上

海的私营书刊发行业亦保持了据 1952 年出版总署对 12 个重要城市的私营书刊发行业所作的统计显示：上海私营书刊发行业无论是在店数、资金、工作人员，还是在销售方面，均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中店数占全国的 33.39%，资金占 63.55%，工作人员人数占 36.02%，销售额占 66.55%。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是新政权所乐见的，对新政权而言，他们信赖和依傍的出版力量主要来自解放区的新华书店系统和国统区的进步出版系统，他们要整合和发展的是以上述两大出版系统为核心的“人民出版事业”。在国家力量的强力加持下，以国营和公私合营为主要形态的“人民出版事业”在新政权建立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 1952 年 9 月，全国已建立了 62 家国营出版社，其中全国性的 9 家，大行政区的 18 家，省市的 35 家。国营新华书店由 1949 年 10 月的 735 个店发展到 1951 年底已有 1086 个店；另外还有 8 个国际书店的分支店。国营的新华印刷厂等出版印刷厂有 12 家，其拥有的机器折合全张米勒机为 128 架，占全国全部书版印刷厂的 585 架米勒机（系折合）的 21% 强，如每日一班，每年能印刷约 6000 吨纸，如每日开两班则能印刷 12000 吨纸。于是，公营与私营出版业之间展开了一场博弈。虽然因为公营出版业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这场博弈本身并没有悬念，但由于上海私营出版业曾经枝繁叶茂、鱼龙混杂，整个博弈过程相当复杂，直到 1956 年初，上海私营出版业才最终被纳入到国家的计划出版体制之中。

第三部分“彻底的地方化：上海出版业‘无言的结局’”对整个报告进行了总结：晚清以来，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繁荣，主要就是私营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换句话说，上海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绝对优势地位，是由发达的私营出版业奠定和确立的，国营、公营或党营的出版业在上海从来未占主导地位。因此，上海一旦失去了私营出版业，也就失去了它在全国出版业格局中的优势。就这个意义上说，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过程，其实也是上海出版业的地方化过程。到 1956 年 3 月 30 日，上海只剩下 12 家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它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政治书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主要出版连环画、宣传画和照片画册；新文艺出版社，以出版中外文学作品为主；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文化教育读物；上海画片出版社，主要出版年画；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通俗文化读物；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综合性科学技术书籍；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医药卫生读物；教育图片出版社，出版教育图片和画册；影印图书出版社，出版影印外文图书；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古籍读物；少年儿童出版社（系中央设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出版少儿读物。上海原有的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龙门联合书局、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上海新音乐出版社等则陆续迁往北京实行公私合营，改建为中央级公私合营出版机构。在国家出版总署之下，上海仅保留了省市一级的地方出版建制。这样，上海的出版业就从体制上被彻底的地方化。上海出版业的地方化，直接导致上海出版物品种、数量逐年减少，上海在全国出版业格局中的重要性亦趋于下降。据统计，1955 年，上海全市共出书 5711 种，其中新书 2581 种，分别占全国的 27% 和 19%。上海出版业主导全国出版业的时代已成为日益飘渺的旧梦，一去不复返了。

担任周武报告评论的是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小滨正子。她指出周武的报告史料充足，数据精确，论点新颖、鲜明、有力，深刻阐述了上海出版业在历史潮流裹挟下从全国的中心走向地方化的过程，以及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小滨教授认为，周武对这一问题的时间设定尤其具有突破性，完全摆脱了一些程式化、概念化的束缚，而是从上海出版业历史性变化的阶段出发，最终锁定了 1945 至 1956 年这一时间段。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周武研究员及其对上海出版业的研究在日本学界已广为人知，因此诸多与会学者对他的报告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纷纷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交流。有的日本学者在会前即已认真地阅读了周武的报告摘要，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49 年以前上海出版业之所以成为全国出版业中心的原因，49 年以后国营、公营出版业的概

念等。周武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近代上海出版业之所以取得全国中心的地位，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首先是“自由”，其次是“安全”，最后是“市场”，这些都是由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造成的。1945年以后，正是由于上述条件逐步发生了变化，才使上海出版业发生了质变。周武还解释了上海解放后“人民出版事业”的内涵、范围等。由于时间限制，许多日本学者感到意犹未尽，于是纷纷抓住会后的时机继续与周武进行交流。

马军副研究员的报告主题是《美援与上海计口配米（1947—1949年）》。马军对四十年代国民党在沪粮政问题素有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即以此为题。

《美援与上海计口配米（1947—1949年）》的内容摘要如下：1945至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争夺国家的执政权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是两党争夺的焦点。其间，粮食危机一直困扰着上海城市，主要体现在供应的不稳定性和粮价的暴涨两个方面，这是社会震荡、民情不安、工潮起伏、学界骚动的内在因素。米潮从形成到发展，从爆发到恶化，当局的措施、米商的态度、市民的反应，几乎每个环节都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问题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它是解读当时上海城市生活乃至全国大局的一把钥匙。

粮食问题从来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社会安定问题，是谁掌握政权的问题。当局者的粮食政策通常被认为具有统御全局的功效，本报告以此为切入点，抓住典型事例及重要机构，采用全景梳理的手法，寓理于述，透过纷繁现象探寻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规律和实质，进而着重展现其导致的社会政治后果，以期揭示这一史段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为解释“大陆易手”这个传统大命题做一新的注脚。

抗战胜利以后，面对米潮频繁，国民党执政当局曾先后采用自由买卖、米商贷款、平价抛售、限价议价等手法予以应对，但均效果不著。1947年6月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成立，由于米源不足，初期只实行局部配米。稍后，美国对华采取有限援助政策，10月27日中美救济协定签订，次年4月3日美国国会又通过《援华法案》，总款项达4.63亿美元。与援欧计划相比，援华的数额实在是个零头，这表明了杜鲁门政府“怒其不争”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它既欲援蒋以促其反共，但又恐大量美援被贪污集团中饱私囊，既想扫清实现欧洲复兴计划的障碍，又不愿开罪为国民党游说的“援外集团”，于是折衷之下选择了小规模援助的手法。结果，美粮的到来为上海地区以及北平、天津、南京、广州等城市实现计口配米（全面配米）提供了可能。

计口配米是国民政府历经战后两年多的粮政困境后，摸索制订出的一项针对大都市的粮食统制政策，其实质是一种非完全性的公卖。之所以说是“非完全性”，是由于它所提供给每个市民的定量并非其所需的全部消费量，而且在销售过程中仍主要仰仗的是私营粮商的承销，并未建立起完全的、或占主导地位的公营分配、售卖网络。当局并非无心于此，实在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米源保证，再加没有充足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决心来另起炉灶。此外，时间的迫促也是一个原因，米潮一个紧接一个，对于眼前的困境当局尚且疲于奔命，难以应付，又岂有余力对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动，只能小修小补而已！尽管如此，在恶性通货膨胀如此严重，经济局势如此恶化的情况下，这一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对于稳定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尤其是大城市，仍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一政策，1948年以后的上海社会将是何种面目！显然，500万市民必将蒙受更大的痛苦，当1949年5月上海战役打响时也将引发更大的纷乱！由此，不能不对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的工作加以某些肯定，撇开政治因素不谈，它在粮食调配业务上确实是较富成效，竭尽心力的，而且较为有效地调动了上海原先颇不健全的保甲制度，对于全市的基层组织和人口状况也作了一番系统清理。

这里还涉及到美援及美援粮食的评价问题。从政治角度而言，美援当然是美国对华政治的重要表现，是控制中国、监督国民党政权的一切施政以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工具，虽然

裹有人道主义的外衣，但在根本上是为谋求美国的远东利益服务的。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摧残了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但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却因远离战场而幸免于难，战后美国成了世界的粮仓。“友好”国家接受美援粮食的代价是，在重要的经济金融措施上听命于美国的调度，用途则须接受其监督，对外贸易亦须予美国以种种方便。正因如此，它遭致了中国某些左翼力量的强烈排斥，认为这是嗟来之食。就经济角度而论，美援粮食乃至先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粮也曾受到了中国舆论的诸多非议。有人怀疑，如果中国当局没有妥善的配合运用方法，那么大批洋米的抵华，虽然可以一时维持人的生命，但对于中国的农村经济势必是个重大威胁，它促使中国不重视自己的农业和农民，延误进行认真的粮食生产运动的时间。那么这几亿美元的功效究竟如何？事实上，尽管中国少数主要城市的供应因此得到了增加，但由于是杯水车薪，财政赤字、外汇枯竭、交通阻滞等情况并未有多少改善，对于遏制通货膨胀、改善全国经济大局更是贡献甚微。不过在美援之中，粮食及日用品的救济，毕竟要比重建工业、农业复兴和军事援助做得较为有效。仅就上海的城市供应而言，配米的一半以上是来自美援，对于缓解困境，保障民食，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美粮的作用应予一定的肯定。

评论马军报告的是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奥村哲。他给予该报告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立意新颖，内容详实，观点独到。他指出，对于“美援”的评价历来易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从而影响到客观性。就整体而言，“美援”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工具，对于支持国民党内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美援”的作用也不宜一概而论，至少在 1947 年以后国民党上海市当局实行的“计口配米”中，有一半来自美国的粮食援助，客观上对于维持上海百姓的基本生存、社会的基本秩序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应该被指出、而不应被忽略的。奥村教授及其他与会学者还就报告中提及的内战时期国民党在上海实行的粮食统制政策问题，与马军进行了交流和切磋。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金野纯的报告题目为《建国初期上海劳动现场的政治动员与大众运动》。金野的报告分为前言、运动的背景、运动的展开、运动的作用、运动的问题、结尾等部分。

“前言”中指出本报告以上海工业领域劳动现场的“三反”、“五反”运动为例，将建国初期的政治动员和大众运动，定位在因新权力、统制的浸透所造成的人们生活世界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同时也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予以捕捉。“运动的背景”回顾了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的决策过程，指出最初“三反”运动针对的是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但随着 1952 年以后“五反”的展开，运动的对象扩展至广大私营企业。运动方针之所以发生转换，固然有在追究受贿方的同时，也向行贿方问责的方面；但也有政府将党内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弊端的责任转嫁到“资产阶级思想”头上，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强化经济统制的战略思考。“运动的展开”中介绍了企业进行“三反”的 4 个阶段，即党内检查、职工代表会议、选举增产节约委员会成员、群众动员与检举揭发。在这个过程中，以非党员厂长为首的管理部门的权威下降，专职党员干部的权力上升；党在职工群众的基础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当时，向家属交代政策、做思想工作，通过他们使贪污嫌疑人认罪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高明的政治技巧。继“三反”之后，“五反”运动的最大作用在于：越出国营、公私合营的范围，将共产党主导的政治动员扩展到私营企业、小型家庭商业和独立手工业（小户）占压倒多数的整个上海工商界之中。在“运动的作用”中，报告从权力、支配、意识形态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作用很大，可体现在以下 3 点：1. 共产党权力的渗透。2. 构建起忠诚与利益相结合的体系。3. 社会主义的世俗化。“运动的问题”分析、披露了“三反”、“五反”的一些过激做法和负面影响，例如用指标来定被检举的人数，导致发生了不少冤案和自杀事件。主要的负面影响有：1. “不得违抗当权者，即党”的运动形态滋生了形式

主义。2. 接近党干部、轻视管理干部。3. 在工厂活动中回避责任。在“结尾”部分，作者对报告进行了总结，指出：建国初期政治运动的过程，是日常的劳动、生产等经济行为与动员等政治行为、以及揭发贪污等法律行为在没有任何媒介的情况下搅合在一起，人们无论意愿如何均将“政治表现”作为一种日常意识的过程。运动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很大，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规范，这是一个绝对价值的生成过程。作为运动的结果，个人主义、奢侈等成为道德批判对象，人们对资本家变得敬而远之。一路前行的“社会主义世俗化”如同196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对毛泽东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大阪经济大学教授山本恒人对金野的报告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该报告的选题很有意义，作者尝试着对“三反”、“五反”运动的内在本质进行了研究。在当时，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存在如同漂浮于资本主义海洋中的红色堡垒，金野以实证的手法考察了中共权力渗透到企业和生产现场的过程，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山本认为该报告以上海作为“三反”、“五反”的分析地区，以档案馆的第一手材料作为主要的分析资料，在进行分析、论述时，将社会学的分析手法运用到历史学之中，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且表示出对作为“政治动员”和“大众运动”顶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关注，这些都堪称本报告的独到之处。与此同时，山本恒人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对报告中提出的、上海政府在“三反”、“五反”中获得的各类罚没款总额达7万2727亿元至7万4900亿元等表示疑问，并指出金野的报告中只引用了国营与公私合营企业的例子，而私营企业的档案现在也是公开的，可以取例引用。此外，还对“社会主义世俗化”的提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生大泽肇的报告题目为《建国初期上海及近郊农村学校教育的重建与“政治教育”》。报告力图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学校教育中是如何发挥政治机能的。报告设定了以下两个课题：1. 建国初期，中共政权是如何传递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这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容是什么？特别是在学校教育领域中，情况又是如何呢？2. 建国初期，中共政权是如何认识学校教育和教师阶层的？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当时的政策文件、报纸杂志上的记载、日记、档案中搜寻资料，以求解明。

报告的第一章阐述了研究命题，对报告中运用的一些概念、基础事例及现象等进行梳理，并介绍了现有的相关研究状况。第二章以教育组织的重组为中心，叙述了解放初期上海及松江的状况。第1节论述了解放不久后上海、松江的学校、教师、学生的状况；第2节则叙述了解放初期，由于农村地区行政人员不足，作为任务，教师和学生除了教育事业外，还被投入到其他事业中的情况。学校因此受到影响，导致教育工作发生混乱。第3节阐明了政府当权者是如何看待作为学校支柱的教师阶层、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政治定位的。第三章论述了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对学校教育产生的实际影响。第1节叙述了伴随土地改革运动而来的相关教育情况。第2节叙述了学校三反五反运动的特征。第3节叙述了抗美援朝中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上述教育运动侧重于时事教育方面，而且在教育实践中，强调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学校教学活动显然由此产生了混乱。第4节涉及了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冬学运动这一社会教育活动。对冬学运动的概要进行总结，并实际证明它不仅是识字运动，还具有宣传意识形态的一面。第四章论述了1952年、即上述政治运动基本告一段落后的情况。通过分析教师阶层、政治课教学内容等阐明学校教育的变化。

通过上述研究，在第五章中，大泽得出以下结论：当时的“学校”与其他所有的“单位”一样，都是进行政治运动实践的“场所”，在传达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时，往往是政治运动优先于静态的（static）政治教育。这样，政治教育就通过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得以开展。而且，学生与教师除了在校内，还被动员去农村、工厂承担宣传工作，可见政治运动规模之大。如此势必引发诸如正常的教学计划受到挤压、学生健康受损等问题。教

师和学生是向社会宣传中共政策的媒介，以及建设基层政权的必要人力资源。这成为国家除了在高等教育之外，还在初、中等教育方面进行扩张的诱因（incentive）。中共一方面对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教师和学生保持着戒心，从解放初开始，上海即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即使在土改和三反五反时期也没有停顿。可是从扩大教育体系的必要出发，许多以前的旧知识分子和教师继续被留用，教师层的人员构成实际并未发生变化。尽管目的不同，但是当局和民众都需要教育，这就促使了学校教育体系的扩大。这种学校教育体系自身的扩大，很快在1953年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即一方面希望求学的人数在增加，而可供就学的学校却不足。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问题——“升学难”，由此变得明显起来。

担任大泽肇报告评论的是明治大学教授高田幸男。他肯定了报告持有的问题意识，并指出所用的一部分史料，如松江区档案馆所藏《新教育》、《苏南文教》等杂志、未公开的私人日记等，在日本都难得一见，说明大泽在上海的两年留学期间是刻苦努力的。高田教授也提出了若干疑问。他对报告中使用的“以中共政权为中心的政权”的提法表示质疑，认为将中共与政权完全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此外，他还对报告将上海作为都市、将松江作为农村，在两者间进行对比是否合适表示疑问，认为在进行比较前，应首先对上海农村地区的情况、松江的城镇化程度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高田教授还指出，报告中没有提到对私塾及塾师的改造，这是一个缺陷。

前来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共有80余人，是日本上海史学界数年来举办的各类研讨会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与会日本学者的认真态度以及热烈的交流气氛表明，上海史研究正日益成为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讨会结束后，学者们参加了高纲博文教授举办的招待会，周武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副院长、其他与会同事向主办方致谢。招待会洋溢在友好的气氛中，实际上成为两国学者切磋学问的又一场“研讨会”。

二

除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中国都市社会变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外，周武等还应邀参加了两场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一是于1月19日晚6时在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举行的“欢迎上海青年学者恳谈会”，这次会议同样是由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主办的，主持人为小滨正子教授。由葛涛做题为《声音记录下的生活——民国时期上海唱片研究》的学术报告；周武、马军分别进行了题为《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上海舞厅业的消逝（1949-1954）》的学术主题演讲。与1月14日的研讨会相比，这次恳谈会的规模较小，且参加者多为青年学人。但会议气氛轻松而热烈，两国的年轻学者们无拘无束地讨论着各自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时而会有争论，时而会产生共鸣。

另一场学术活动是受日本神奈川大学孙安石教授之邀，于1月20日前往位于横滨市的神奈川大学参加日本“《良友》读书会”的例行活动。该会聚集了一批《良友》画报的日本同好，他们时常以聚会的形式交流各自的研读心得，其主要成员孙安石、菊池敏夫、石川照子等都同时也是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多年来在上海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利用这次机会，周武应邀向与会者介绍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年来在上海史、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方面的成果，表达了希望与日本学人加强学术交流及互动的愿望，并诚挚地邀请日本学者前往历史所访学，与会日本学者对此表示感谢。

历史所3位学者本次访日的行程共10天，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中国都市社会变动”国际学术研讨会、“欢迎上海青年学者恳谈会”、“《良友》读书会”例行活动之余，他们还访问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科研和高等学术机构，尽可能与更多的日本学者进行接

触、交流，探询学术上的共同点和热点。虽然活动紧凑，但在东道主的悉心安排下，所到之处均受到友好的接待，使上海学者们收获颇丰。一行感到，在日本确有大量可供研究所用的珍贵资料，日本学者的经验和成果中也颇多可供借鉴之处，双方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可以促使学术研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1月21日，东京飘起了数十年未遇的漫天大雪，高纲博文教授等冒雪为周武一行饯别。大家既为本次研讨会成功举办感到由衷的欣慰，也切实感受到了两国学者之间的信赖与友情。

作为中国、日本研究上海史的重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之间的交流可谓渊源流长。在熊月之、古厩忠夫、高纲博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开创下，从上世纪80年代中叶起，两国上海史学者间的交往即日见频繁。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上海史研究在海内外的兴起，中日学界的互动更是紧密，至少“年必一聚”。古厩忠夫、高纲博文、小滨正子的著述经由历史所译介，不断呈现在中国学人和读者的面前；而熊月之、周武等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也早已为扶桑学界所津津乐道。双方还合作举办过若干次大型学术活动，如2002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等，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必须指出的是，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作为一介民间学术团体，在既无固定挂靠、又无稳定财源的情况下，为弘扬上海史研究、促进中日学术界的交流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虽然中日两国之间目前存在着许多难题，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学术界的交流就越应得到提倡和发扬。